

定”(EPA)签署,以及日本在亚太区域贸易谈判中影响力的增强。在刚结束的大阪G20首脑峰会上,安倍与13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。而8月横滨举行的非洲发展国际峰会(TICAD),将成为日本进一步在非洲拓展“战略性外交”的机遇。

但同时需要看到,日本自身战略主体性的提升,包括对区域合作中的“引领者”及“建设者”角色,并未充分体现在东北亚。一方面,日本虽然试图改善东北亚外交,但一系列举措下,日本与近邻关系的结构性困境不但未能解决,反而有所加剧。安倍今年公开提出以朝俄为主要目标,集中力量开展“战后外交总决算”,但目前在对朝、对俄政策上均面临难题,对韩关系又因历史问题而进一步恶化,尤其是7月1日日本宣布加强三种材料对韩国的出口管制;另一方面,日本参与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政策目标和力度不及外界预期。在安倍“俯瞰地球仪外交”中,东北亚的比重似乎正在下降。

之所以出现以上的局面,既由于东北亚自身地缘环境的客观情况,也和日本自身政策的主观选择直接相关。从全球范围看,东北亚目前可以说有“四最”:经济引领力最强,政治安全不确定性最高,大国力量集聚和战略博弈强度最大,不同价值观、

战略思想、治理经验碰撞最激烈。

“四最”的存在增加了地缘经济、政治及文化局面的复杂性,也提升了区域合作的难度。而且,当前的大国战略竞争强化了东北亚地区的“二元背离”,即各国安全上依赖美国,经济上依赖中国,并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各国外交政策的矛盾,使得区域合作难以形成合力。值得指出的是:在东北亚,有两项阻碍区域合作的“负遗产”和日本直接相关。一是区域历史和解没有完成;二是冷战式对抗结构依然存在,体现在日美同盟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结盟安全观。

除客观环境限制外,日本自身的东北亚政策也存在“主观误区”。至少在心理上,日本有两个固有的、并不理性的倾向:一是先入为主的“危机判断”,因此始终依赖美国,并优先从安全自利角度考虑东北亚关系;二是根深蒂固的“历史偏见”,对中韩两个近邻的认知总是纠结于各种“历史类比”,对两大邻国充满了复杂看法和竞争心理,尤其对中国在领东北亚和亚太合作中的地位,总是倾向于从“战略扩张”乃至“重建霸权”的角度加以认识,并进行牵制。在历史问题上,保守政治精英们也坚持通过修正历史观和强调“未来志向”,试图摆脱中韩的“纠缠”,而拒绝通过真正的历史反省。

由于以上的政策倾向,在政治、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,日本在东北亚所发挥的负面作用,实际要大于正面作用。而在经济和区域合作制度方面,日本曾经发挥的正面历史作用正在消退,曾经的“引领角色”“示范作用”被中国取代。

目前,作为区域大国之一,日本在东北亚的应有角色并得到未有效发挥。不过,日本对于东北亚区域环境的依赖仍是根本性的,日本也清晰地认识到,自身战略需求仍和东北亚密切相关。日本的安全有赖于东北亚的和平安定,经济增长也仍需以东北亚的发展作为依托。

目前一个有利的条件是,中日关系正在逐步改善,形成了诸多共识乃至行动,过去的事实证明,中日关系一旦稳定,并形成某种程度的“内需驱动”“自力发展”,则中日韩三方机制也可以运转起来,而外部因素(如美国)对东北亚合作的干扰则会得到相应的限制。另外,日本在推动“战略性贸易外交”,构筑“贸易圈”的过程中,也日益意识到,东北亚仍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,日本要想维护有利于己的自由贸易体制,参与主导规则制定,不能离开东北亚国家、特别是中国的支持。

(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)

安倍访朝能否成行

文/李成日

长期以来,朝日关系受到东西冷战、日美同盟、韩日关系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,一直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。朝核问题、日本人“绑架问题”以及对历史问题的清算,是冷战结束以来朝日关系的三大

热点问题,日本政府长期坚持将这三大问题的“一揽子解决”作为对其朝鲜外交的基本方针。

2019年2月朝美河内首脑会谈无果而终后,安倍与特朗普电话会谈后表示,“下一步将会是我跟金正恩委员

长的直接会谈”。尽管如此,日本政府还是再次延长对朝鲜的单独制裁,继续全面禁止对朝贸易,并禁止朝鲜籍船舶以及停泊过朝鲜的日本和其他国家船舶的入港。

5月6日,安倍与特朗普会谈回

国后表示,不设任何前提条件,希望尽快与金正恩实现朝日首脑会谈。此前安倍曾多次强调,举行日朝首脑会谈,必须有利于解决日本人的绑架问题。但是他的这次发言大大改变了过去的对朝态度。

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提出“战后外交总决算”,试图摆脱战后体制。要实现所谓“战后外交总决算”,日本必然要解决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:一是与俄罗斯解决“北方四岛”(俄称“南千岛群岛”)问题,二是跟朝鲜建交,解决二战和殖民统治遗留的历史问题。由于日俄领土纠纷在短期内难以发生突破性进展,安倍能够发挥能动作用的就是对朝关系,也就是实现日朝首脑会谈。

自2018年3月以来,金正恩已五次习近平、三会文在寅、三会特朗普、一访俄罗斯。尤其是2019年6月20~21日习近平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,为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。因此,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唯独没有跟日本领导人进行会面,使日本在半岛问题上感到“落伍”。

尤其是2019年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。自民党虽有望获胜,但难以改变参议院议席减少的局面。为应对参议院选举,而且考虑到日美同盟以及日韩矛盾,安倍希望尽早实现日朝首脑会谈,提高自己及自民党的支持率。

另外,最近日本的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一些动向值得关注。尤其是2019年5月21日日本外务省网站上首次公开1957年7月成立的“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后方司令部”的消息。其实,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否认介入朝鲜战争的事实,但这次明确公开1954年2月日美两国签署的《关于在日本联合国军地位的协定》及其“正式议事录”的文本内容。目前,“联合国军后方司令

部”设置于驻日美军基地横田机场,有三名军官常驻,而且由澳英法加等九个国家驻日武官担任联络军官。

此前的5月14日,联合国军司令、驻韩美军司令艾伯拉姆斯访日,与河野外相举行会谈,强调了双方的合作关系。日本方面突然公布这一事实,可能是由于中朝、朝韩、朝美、朝俄之间首脑频繁互动,使日本感到“被边缘化”。因此,追求“政治大国”目标的安倍首相必须在半岛问题上寻找新的外交出路,做出日本的“贡献”。

虽然安倍已多次表示愿意无条件举行日朝峰会,但要考虑的变数与困难仍然很多。问题的关键在于,日方还没有拿出具体的诚意,能给朝鲜何

种“大礼包”。

另外,朝方也认识到,日本领导人表示愿意举行朝日峰会,很容易被日方利用于国内政治,尤其是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。6月17日,朝中社发表评论说,“日本的两手策略是行不通的”,要求日本解除对朝单独制裁。同一天,《朝鲜新报》(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机关报)也发表评论,表示日本想跟朝鲜进行对话必须拿出诚意、做出实际行动,不要只是空论。

大阪G20峰会刚刚结束后的6月30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借访韩之机,突然访问板门店跟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了50多分钟的会谈。之后,虽然安倍首相再次强调希望无条件地跟金正恩进行会晤,但是朝美关系已经



供图东方IC

2019年6月28日,安倍与文在寅“亲密”握手。两天后日本就对韩国实行出口管制。

走出河内会谈失败的阴影，达成共识继续进行协商。朝鲜将充分利用此次机会，更会把精力集中于对美关系的改善。因此，如果日本向朝鲜拿不出具体改善措施，很难得到朝方的积极回应。

对朝鲜来讲，通过改善对日关系，从而获取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经济补偿一直是个“画饼”。因为虽然2002年和2004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曾经两次访问朝鲜，但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，反而关系变得恶化。其实，日本并没有认真考虑跟朝鲜建立外交关系，而且始终非常在乎日美同盟以及美国对朝鲜的态度。因此，如果美国不改变对朝敌对态度，那么日本也

很难突破美朝对立关系的框架。而且，目前尚未具体了解朝美板门店会晤的具体内容，所以日本也很难在短期内主动打破美朝之间的对立格局。

7月1日，日本突然宣布将限制对韩国出口三种用于制造半导体的材料。预计韩国政府也将做出相应的反制措施，这样一来，韩日关系将进一步恶化。

朝美板门店会晤以后，外媒普遍指出中美朝韩都发挥了积极作用，这使日本再次感到“落伍”。加上，中朝、美朝、朝韩之间的频繁互动，而且韩日关系的恶化，必然给日本对朝政策带来巨大的压力。

今后，日本如何巧妙地在美国

主张的“大交易”和朝鲜主张的“小交易”之间，寻找到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，关系到日本的对朝外交的成败。其实那就是“一揽子协议、分阶段实施”。日本既要推动朝美关系改善，也要改善日朝关系，解决双方的悬案，从而逐步实现朝日关系正常化。这才是作为东北亚地区大国的日本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外交方向。因此，日本在对朝关系上有一定的外交机会和空间，但如果拿不出诚意和具体措施，仍然采取机会主义态度，那么它在半岛问题上将会进一步被边缘化。

(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)

韩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角色

文 / 董向荣

在东北亚双边、三边乃至区域合作中，韩国的角色不是单一、稳定的，而是复杂的、多变的。

1992年中韩建交后，经济关系突飞猛进。目前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、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。在国际关系发展历史上，建交26年的时间，双边贸易额能达到3000亿美元级别的国与国关系，恐怕只有中韩关系。

在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史上，2015年12月生效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(FTA)是一个里程碑。2019年6月27日中韩两国领导人在大阪会晤，就FTA第二阶段谈判进行了沟通。文在寅总统表示期待两国间持续合作，韩国积极支持多边主义开放主义贸易体制。习近平主席指出，要把握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机遇，加快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，不断扩大贸易、科技、财经、环保等领域合作。

对于中韩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，韩国方面的心态是复杂的。在通过经济合作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，也担心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会产生政治安全风险。2013年笔者曾在《中韩经济关系：不对称依赖及其前景》一文中指出，韩国担忧不对称依赖可能成为中国的权力资源，于己不利，试图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。在既定贸易条件下，韩国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可能已经接近或达到峰值。

在韩国，对朝关系是不包含在对外关系中的，而是本民族内部的南北关系。韩国人口数量大约是朝鲜的两倍，经济规模大约是朝鲜的50倍，韩国在经济上的优势相当明显。

在开展与朝鲜的关系方面，文在寅政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，提出了“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构想”，主要是对未来半岛及周边经济功能进行远期规划，勾勒一个“H型经济发展布

局”，即“两纵一横”：环东海（即日本海）能源—资源带，环西海（即黄海）产业物流—交通带，横贯朝鲜半岛、分布在三八线南北各两公里的非军事区和平旅游带，以及构建雪岳山—金剛山—元山—白头山（即长白山）旅游带，开发非军事区生态—和平旅游区。金正恩与文在寅已经进行了四次首脑会晤，但是，因为在无核化问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，且受制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，南北经济合作举步维艰。

目前，韩国拟通过“新北方政策”加强与俄罗斯、蒙古、中亚国家等的合作。

借鉴卢泰愚政府对苏联、东欧、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“北方政策”，2017年文在寅总统提出“新北方政策”，旨在打造一个巨大的经济区域，从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，再扩展到东北亚和欧亚大陆，要在天然气、铁路、海港、电力、北极航道、